

试论明北京城的形成过程及其文化意义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Beijing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晋宏逵

Jin Hongkui

内容提要：

元末至明初，朱元璋先后营建了吴王国都、大明京师南京和中都凤阳，确立了明代都城规制，同时收缩了元大都面积成北平府城，在元大内建设燕王府。明成祖于永乐元年改北平府为北京，永乐四年开始筹备营建北京，十四年开始建设宫殿坛庙，再现南京宫庙规制。皇城之外大部分地区延续了元大都的建设成果。明英宗进一步完善都城功能。明世宗改建礼制建筑，并南拓北京城。

关键词：

两都制 元大都 燕王府 北京中轴线 四郊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early Ming Dynasty, Zhu Yuanzhang successively built the capital of the Prince of Wu, the Ming capital of Nanjing, and the central capital of Fengyang, establishing the Ming Dynasty's capital city system. Meanwhile, he reduced the size of the Yuan Dynasty's Dadu to create the Beiping Prefecture city and built the Prince Yan's mansion within the former Yuan imperial precinct.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Yongle reign, Emperor Chengzu renamed Beiping Prefecture to Beijing. Preparations for building Beijing began in the fourth year, and construction of palaces and temples started in the fourteenth year, reproducing the palace-temple system of Nanjing. Most areas outside the Imperial City maintained the architectural achievements of Yuan Dynasty's Dadu. Emperor Yingzong further improved the capital's functions. Emperor Shizong rebuilt ceremonial buildings and expanded Beijing southward.

KEYWORDS:

Dual-Capital System, Yuan Dadu, Prince Yan's Mansion, Beijing Central Axis, Four Suburbs

明代营建并最终定都北京,无疑是15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与营建北京城同时期的,明王朝还创建了长陵,扩建了武当山宫观等,为我们遗留下一批珍贵的文物建筑遗产。多年来,学者们就北京城营建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有些问题仍有探讨余地。本文拟从明北京城形成过程及其对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为主题作一些讨论,就教于诸位学者。

一、营建南京城与凤阳府

明太祖朱元璋毕生都在探索定都问题,实际进行了明中都和明南京的建设,在两地遗留了遗址和遗迹。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夺取太平。当地名儒陶安进言,金陵是古帝王之都,义军应占据形胜之地,出兵以临四方。次年三月,朱元璋的部队占领集庆,他遂改元集庆路为应天府,作为征讨群雄和对抗元朝廷的根据地。战局发展证实了应天的战略价值。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就任吴王,设立百官。至正二十六年(1366)底龙凤皇帝韩林儿溺水身亡,朱元璋脱离了红巾军,次年改元吴元年,“立郊社、建宫宇”,由此开启了南京建设的第一阶段,即吴王国都阶段。

1368年春正月,朱元璋在刚刚建成的圜丘祀天,宣告大明诞生,建元洪武。这时南方群雄荡平,明军与元军决战,北上西进势如破竹。明军取得汴梁后,朱元璋亲临视察。八月初一日颁发诏书,宣布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紧接着,徐达大军攻陷元大都。年底又攻克太原。次年四月攻下奉元路,改称西安府。大明增设了山西、陕西两个行省。洪武二年(1369)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做了一个重要决定:“诏以临濠为中都。初,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之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群臣皆称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焉。”^①也就是说,从这时开始,大明开始进行“两都制”的建设活动。

明中都的建设从洪武四年(1371)正月开始,由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亲自在临濠督工。朝廷把临濠升格为凤阳府,从郊庙到宫室、城池,都已经基本成型。洪武八年(1375)四月,朱元璋到凤阳验工赏劳,不料他发现“役重伤人”“有司叠生奸弊”,^②果断决定停止中都建设。

在“两都”建设时期,明太祖改建了南京吴王时期的祭祀建筑,务必使之符合古礼;还修筑京师和内城的城垣;中都停建以后,开始改建南京大内宫殿。朱元璋重申了“但求安固,不事华丽,朴素坚壮,可传永久”^③的十六字方针,最终,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创立了明代第一座都城,确立了明代都城规制。

但是南京建设是以六朝故都旧址为基址的,朱元璋对大内规划心存遗憾。洪武二十四年(1391),他派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五,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页。本文所引明代各朝实录(包括后述《明英宗实录》)均采用此。

② [明]朱元璋:《中都告祭天地祝文》,《明太祖文集》卷一七,《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

③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一,第1页。

太子朱标去陕西考察关中形胜，朱标回南京献上地图，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但不久，朱元璋就患病去世了。老皇帝只好把是否再选最佳都城的心愿交付上天了。

二、改建元大都城为明北京城

明北京城的建设过程是对元大都城成功的“旧城改造”。先简单回顾一下元大都的概况。

（一）元大都概述

元大都城规划以金代中都燕京城的近郊离宫大宁宫为中心，首先建设了西苑琼华岛，至元元年（1264）将“湊山大玉海”放置到广寒殿。至元四年（1267）开始建造大都城垣，至元十三年（1276）建成，期间也建成了宫城的主要建筑，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命名新城为大都。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记录了大都城垣的规制：“京城……城方六十里，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考古发掘证实了记录的可靠性，还测量了城墙各面长度，北面6730米，东面7590米，西面7600米，南面6680米，周长约28600米。^①1969年，拆除明代西城墙时发现了包砌在城墙里面的元和义门瓮城门遗址，说明大明北京东西城墙是以元大都东西城墙为基础的。

元大都的皇城在文献中称为“外周垣”^②，或“萧墙”，“俗呼红门阑马墙”，位于全城南部偏西，周长约二十里。^③正南门名为灵星门，与京城丽正门相对，两门之间有千步廊街。皇城之内，宫城及其御苑占了东侧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宫城之西是贯通南北的太液池。池西岸，南部有隆福宫和西御苑，北部有兴圣宫和后苑。考古勘查的结果，萧墙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

宫城也常被称为大内，“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砖甃”^④。宫城南面有三座城门，正门崇天门，开五个门洞；城楼是“双阙五凤楼”形制，正楼面阔十一间。崇天门左建星拱门，右建云从门；东西城墙中间位置分别建东华门和西华门；北墙建厚载门。

宫城内最重要的建筑在中轴线上，前后排为两组，称为“大内前位”与“大内后位”。前位以大明殿为中心，后位以延春阁为中心，各自用廊庑围合成封闭院落，称为周庑。前位周庑的南面，中央部分建正门七间，叫大明门；左右还各有三间便门，东叫日精门，西叫月华门；院子东西两面中间位置各建左右门五间。门南方的廊庑中部，东面又建五间钟楼，名为文楼；西面建五间鼓楼，名为武楼。周庑北面也建正门和便门。大明殿坐落在周庑的中心位置，是皇帝举办登极、朝会、庆祝寿诞和元旦等重大活动的“正衙”，面阔

① 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地图集》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②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津逮秘书本。

③ 〔明〕萧洵：《故宫遗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④ 前揭《南村辍耕录》卷二一。

十一间。它的北面有寝殿，主体建筑五间，左右各有三间夹室，后边又连着三间香阁。大明殿和寝殿之间连以柱廊，形成“工字殿”的格局。大内后位与前位格局相同，只是正殿减小为九间，但是用了两层楼阁形式，显得更高耸华丽。

宫城西侧太液池的中部有两座岛，北部大些的就是金代琼华岛，至元八年赐名万寿山，文献中也称万岁山，山上建有广寒殿，景色如画。南部小些的称圆坻，建有仪天殿。圆坻东有木桥通大内夹垣，西有木吊桥通兴圣宫夹垣，北有石桥通万寿山。万寿山东也有石桥，桥上有一条引水渠引金水河水上山。

太液池西南部有隆福宫及西御园。隆福宫整体格局也是外有长方形宫城，城内再用周庑围成院落。与大内的区别，一是宫城门只是“红门”而不是宫门，二是这里只有一组周庑围合的建筑。周庑总间数比大内少。正门五间，小于大内正门的七间。正殿名光天殿，只有七间，既小于大内前位大明殿的十一间，也小于大内后位延春阁的九间。正殿和寝殿也是工字殿的形式。寝殿的东侧有寿昌殿，西侧对称建有嘉禧殿，也被称为东暖殿和西暖殿，殿内应该有专用设施，与大内后位相似，其他宫里是没有的。兴圣宫在隆福宫北，万寿山正西，其主要宫殿制度与隆福宫相似。

元大都的街巷设置是城市规划特色之一。全城在萧墙以外的地块都设置了棋盘格式的街巷。“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街通。街通二字本方言。”^①沿各城门排布的都是大街，大街间有小街。大小街之间形成面积不等的矩形地块，划分为五十坊进行管理。地块内再排布东西向为主的火巷及街通，它们划分的小地块再划为八亩一块，“听民作室”。庙社、衙署、学校、仓库都占据较大地块，但一般不打破“坊”的界限。

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前人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将元大都规划结构的特点归纳为以下5点：

第一，整体上继承了汉族传统文化中关于都城规划的思想。首先，体现“择天下之中以立国，择国之中以立宫，择宫之中以立庙”^②的思想。其次，规划原则与《考工记·匠人营国》描述有部分一致。《考工记》属于《周礼》六篇之一，具有儒家经典地位。《匠人》关于都城规划的要点是：1.宫城是全城规划的核心，宫城位于王城的中心。宫城南北中轴线便是王城规划的主轴线。2.宫城前面为外朝，后面为市。宗庙、社稷则据中轴线对称设置在宫城前方的左右两侧。这便是宫、朝、市、祖、社五者的相对规划位置和它们之间的关系。3.全城道路网及里坊均环绕宫城这个核心，沿中轴线对称布置，突出宫的地位，并衬托着中轴线的主导作用。4.宫城内是按前朝后寝之制规划的。^③

第二，以湖泊为核心安排宫城。这是元大都城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之一，是元代的创造。

第三，隋唐以来至北宋的都城都将皇城设在京城北部，皇城之南设中央大道。大道宽度，长安的朱雀大街155米，洛阳定鼎大街147米，汴梁御街300余米。元大都皇城设在京城南，灵星门前只设千步廊，北门厚载红门外也没有设特别宽而长的大街。

第四，大内、太后宫、太子宫各建宫城、御苑。大内之中分设前位与后位，每位都包括正殿和寝殿，格

①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页。

② 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吕氏春秋》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1页。

③ 贺业钅：《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第一章，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局相同，与《考工记》记载的层层深入的朝寝制度完全不同。

第五，“中国古代城市由封闭的市里制转变为开放的街巷制滥觞于唐末五代的江南，在北宋中期，汴梁由市里制改造为街巷制后成为定制。但是作为按街巷制原则进行规划平地创建的都城，大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①。

最后还要说明，对大都城中轴线现在还在研究中。根据现在发布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我赞同明北京中轴线在元大都中轴线基础上南伸的观点。元大都中轴线南端，“世祖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②所以中轴线南穿过丽正门是无疑义的。中轴线北端穿过鼓楼与钟楼也是明确的。“齐政楼，都城之丽譙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③“（昭回坊）前有大十字街，转西大都府、巡警二院，直西则崇仁倒钞库、西，中心阁，阁之西齐政楼也，更鼓譙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④常引起歧义的是中心台的位置。“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⑤我看这句话与中轴线穿过钟鼓楼并无矛盾，因为中心台是“四方之中”，不仅在大都南北方向的中轴线上，也在大都城东西方向的横轴线上。这个特性与钟鼓楼的区别是明显的。北京大学李零先生指出，中心阁在万宁寺中，“阁以台名”；“我怀疑，中心台在（今）钟鼓楼之间”，^⑥比较有说服力地解答了中心台与钟鼓楼的位置关系。

（二）改建北平府城与燕国王城

洪武元年（1368）八月初二日，大将军徐达的军队填平齐化门外的壕沟，攻入元大都。皇帝收到徐达破元都贺表，命改元大都路为明北平府。初九日，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十一日，“督工修故元都西北城垣”。^⑦《洪武北平图经志书》记载：“旧土城一座，周围六十里，克复后以城围太广，乃减其东西迤北之半，创包砖甃，周围四十里。其东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阔五丈。濠池各深阔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阔至十八丈有奇。”《寰宇通志》也载：“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⑧可知徐达出于对元战争的需要，在大都城北墙之南五里的地方另筑一道新的北城墙，原本空旷的大都城北部，及其东西两侧的光熙门、肃清门失去了原来城池的意义。根据现存遗迹考察，“北取径直”，应该是以光熙门南，元代坝河南岸为开端。坝河即成为北平府北城墙的护城河。“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约占北城墙全长的88%，亦即到积水潭东北水面较狭窄的地方为止。所以有学者认为，其余城西北斜角的部分，就

①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上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②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13页。

③ 前揭《析津志辑佚》，第108页。

④ 前揭《析津志辑佚》，第116页。

⑤ 前揭《析津志辑佚》，第104页。

⑥ 李零：《北京中轴线：万宁寺、中心阁与中心台》，《读书》2022年5期。

⑦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三四，第7、9页。

⑧ 转引自《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04页。

是“修故元都西北城垣”所指的部分，是有道理的。^①

新筑北平府北墙，规格标准要高于元大都墙。至于所说“创包砖甃”，恐怕只限于北城墙，或是更局部的做法，绝不是周围四十里全部包砖。新筑的北城墙开辟了两座城门，九月初一日，徐达将它们命名为安定、德胜，取代了安贞、健德两门。经过这次改建，北平府城成了一座东西略长于南北的长方形城池，西北方缺一角。共有九座城门，除北城墙的两座城门外，其余七门均沿用大都城门。

徐达占领元大都以后，“封其府库及图籍宝物等，又封故宫殿门，令指挥张焕以兵千人守之”。^②洪武二年三月大明设北平行省，以北平府为治所。重要衙署就直接使用了元大都旧衙署，如北平都指挥使司使用元枢密院；北平按察使司使用元御史台。^③到十二月丁卯，朱元璋任命赵耀为北平行省参政。“上以耀尝从徐达取元都，习知其风土民情、边事缓急，改授北平，且俾守护王府宫室。既而召入……耀因奏进工部尚书张允所取北平宫室图。上览之，令依元旧皇城基改造王府。耀受命，即日辞行。”^④可知明初从来没有安排过拆毁元宫室的工程，反而是谨慎保护，这时准备改造为王府。

中央集权是明代的国体；同时，皇帝把太子的弟弟们封为亲王，到全国的重要地区担任藩王，形成与中央集权并行的亲藩体制。朱元璋从洪武二年起，亲自起草、反复修订写成一篇《皇明祖训》作为家法，严密、全面地规定了亲藩制度，要求后代一字不可改易。洪武三年（1370）四月初七日，朱元璋分封了秦、晋、燕、吴、楚、齐、潭、赵、鲁等9位亲王及靖江郡王。七月初五日，工部尚书张允提出了诸王府选址意见：“诸王宫城宜各因其国择地。请秦用陕西台治，晋用太原新城，燕用元旧内殿，楚用武昌灵竹寺基，齐用青州益都县治，潭用潭州玄妙观基，靖江用独秀峰前。”^⑤洪武四年，君臣经多次讨论基本明确了亲王宫殿的制度，于是在十月宣布诸王宫殿开工。《大明一统志》《明史》和一些方志采取了把册封亲王的时间作为开始建设王国宫殿的时间，是不准确的。我根据《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综合分析，认为洪武四年开工的只有秦、晋、燕亲王府和靖江郡王府四处。

此后，君臣多次讨论王府建筑各细节，如宫殿额名，主要建筑用青色琉璃瓦，彩画颜色和纹饰等。所以这四座王府是“边设计边施工”的。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燕王府竣工，工期8年。4个月后，21岁的燕王进驻封国。

那么燕王府是“依元旧皇城基”的哪一部分进行改造的呢？《春明梦余录》说：“初，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⑥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但我认为是不对的。

《皇明祖训》规定“凡诸王宫室，并依已定格式起盖，不许犯分。燕因元之旧有”^⑦。明确指出了燕王府的特殊性，不可效法。《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七记载了燕王府的制度：“社稷、山川二坛在王城南之右。王

① 李燮平：《明初徐达筑城与元大内宫殿的拆毁》，《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②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三四，第1页。

③ 参阅徐莘芳：《元大都枢密院址考》，《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元大都御史台址考》，《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④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四七，第4页。

⑤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五四，第1页。

⑥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古香斋袖珍十种本。

⑦ 《皇明祖训·营缮》，明洪武刻本。

城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门楼廊庑二百七十二间。中曰承运殿，十一间，后为圆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间。承运殿之两庑为左右二殿。自存心、承运周回两庑至承运门为屋百三十八间。殿之后为前中后三宫，各九间。宫门两厢等室九十九间。王城之外，周垣四门。其南曰灵星，余三门同王城门名。周垣之内，堂库等室一百三十八间。凡为宫殿室屋八百一十一间。”可知王城格局是：外围周垣，内建王城；前朝三大殿外“周回”两庑；寝宫三重有两厢。

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根据旧档定“王府制”，还写进了《大明会典》。据“王府制”与燕王府比较，可以发现：1.王城及朝寝外围建筑间数，燕王府远超王府制。王府制，王城周围不详，前朝周围廊房82间，寝宫周围廊房60间；燕王府，王城门楼廊庑272间，前朝周围138间，寝宫宫门两厢99间。2.朝寝各殿间数，燕王府远超王府制。王府制，前殿7间、穿堂5间、后殿7间；前寝宫5间、穿堂7间、后寝宫5间。燕王府，承运殿11间、圆殿9间、存心殿9间；前、中、后三宫各9间。3.制度特殊：燕王府周垣南正门叫灵星门，承运殿两庑有左右二殿。

廊房多寡，说明了庭院的宽阔程度。燕王府廊庑既多，王城占地必远广于王府制，且令人想到元各宫的周庑制度。而且“承运殿之两庑为左右二殿”，令人联想元大内文楼、武楼的配置。再者宫殿间数是表达建筑等级的方法之一。燕王府承运殿达到11间之广，三座元代宫城中只有崇天门和大明殿是11间规模。在大明立国不久，处处强调礼制的时候，专为燕王府建造11间正殿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座大殿只能是沿用元旧大明殿。至于周垣南正门用灵星门，明显是元代萧墙墙的延续。只是燕王府中绝不能出现带有两观的阙门，所以崇天门应该被拆毁了。洪武九年（1376）四月，燕王手书致他的表兄、曹国公李文忠：“燕王今遣承奉吴祥赉手书致表兄曹国公：为营造事，所有宫殿相度，可存者存，若无用者拆去须要停当。其营房务要好去布置，如法起盖。开河之事，若有人力可以兴工。若人力不敷且歇，今当仲夏，宜善保不具。”^①说的正是对元代宫殿的处理方针。

（三）改建北平府城为大明京师

明建文四年（1402），靖难部队进入南京，六月十七日燕王在“劝进”声中登基，成为大明的第3位皇帝。第二年，永乐元年（1403）正月十三日，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上言，北平布政司是皇帝承运兴王之地，应该按照太祖高皇帝立中都的做法，立为京都。皇帝马上批准了这个建议，定北平为北京。经过三年休养生息，北京的元气逐渐恢复，为建立都城打下了基础。

对永乐帝营建北京城的起始年代，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今人研究也没有较统一的说法。我根据史料的记载，认为这个伟大的工程必然有一个相对复杂并较长的筹备阶段，它的开始就意味着工程的开始。这样，我把永乐时期北京营建工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筹备阶段，从永乐四年闰七月到十二年正月（1406年8月—1414年2月）。修整阶段，从永乐十二年正月到十四年八月（1414年2月—1416年9月）。建设宫殿坛庙的阶段，从永乐十四年八月到十八年十一月（1416年9月—1420年12月）。

① 瞿兑之：《李文忠集传》，中国营造学社编：《岐阳世家文物考述》，北平：京城印书局，1932年，第18页。

永乐四年闰七月初五日，在朝堂大会上，“靖难之役”第一功臣丘福带领群臣，恳请皇帝“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会议上随即部署五件大事：1.派遣重臣采伐大木；2.命重臣督领烧造砖瓦；3.工部征发天下各行业工匠；4.由南京、河南、山东、陕西、山西、中都和直隶各卫中选取军工；5.由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和南直隶各州选取民工，明年五月到北京，每半年一更换。会议是北京营建工程开始的标志。

朝堂于会议之后，动员了全国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始了筹备工作。在政务管理方面，首先，为北京正名。在军、政、警备（兵马指挥司）、税务等方面提升北京的地位，令与南京相同。永乐七年（1409）正月，朱棣即将巡幸北京，礼部提议改正原燕王府的宫殿名号，这样就可以用原燕王府充当皇帝的“行在所”。所以，永乐七年以后至十五年“西宫”建成之前，文献中出现的“北京奉天殿”就是原燕王府正殿。其次，提高北京的物资运输能力，疏通元代通惠河，修治西湖景（即清昆明湖）堤岸和闸口，以及从文明门到通州各闸；疏浚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从北京到南京设置递运所数十处，每所民丁三千人，车二百辆。这样提升水路“漕运”和陆路转运的能力，把营造所需的海量物资运到北京工地。

建筑材料储备方面。派遣重臣到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进行组织采伐督运大木。大直径和超长的优质楠木，需要到人迹罕至的深山采伐，“一木下山，常损数命”。下山的木材要结成木筏，通过运河到达北京，仅水运需要一年多的时间，贮存到神木厂和大木厂。正统二年（1437）统计，齐化门外木厂积存的大木还有38万根。烧造砖料的砖窑主要有临清窑和苏州窑两大系统，分布在南北两京的直隶地区和山东、河南的运河两岸，分别烧造城砖和金砖。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估算，仅地面、墙垣和三台，用城砖就达八千万块以上，重193万吨。采运石材和烧造石灰基本是在北京附近的山区。台阶、御路、栏杆等所用的汉白玉石开采自房山大石窝，巨大尺寸使得开采出塘与运输都十分艰难。万历二十四年（1596），为重建乾清宫和坤宁宫备料，工部营缮司郎中贺盛瑞查阅了嘉靖朝的资料，当时“三殿中道阶级大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同知、通判、县佐二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船、资渴饮，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十一万两有奇”^①。黑瓦、琉璃瓦在北京黑窑厂和琉璃厂烧造，由工部营缮司直接管理。^②

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二十四日，朱棣第二次来北京“巡狩”时命停运“营造砖”，遣散服役的军民人夫。二月二十九日，又命行在工部，凡营造夫匠，全都遣散还家，明年再来赴工。推测此时繁重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但是仍有些工程是在此期间开始的，如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十三日开“北京下马闸海子”^③，向南延展至太液池水面。

永乐十四年（1416）八月十八日，皇帝下达了复工的命令，全国军民，凡是参加北京营造的开始分番赴工。所在地的官府要给每人发五锭钞做道里费。10天之后，开始营造西宫。“丁亥，作西宫。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宫，为视朝之所。”^④就是说，以燕王府改名而成的北京“旧

① [明] 贺仲轼：《两宫鼎建记》，学海类编本。

② 近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毓蔺教授关于明初营建北京所用建筑材料的研究取得丰厚成果，可以参阅。

③ 前揭《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五，第1页。

④ 前揭《明太宗实录》卷一七九，第3页。

宫”需要拆除更新，因此在新宫殿建造过程中需要建一处“视朝”之所为过渡，位置在旧宫之西。所以“作西宫”也是拆除旧燕王府以及元大内其他遗存的开始。西宫地点，推测在元隆福宫旧址，亦即《春明梦余录》所说西苑。西宫共有1630间宫殿，仅用8个月时间就竣工了，推测其原因是隆福宫虽然空置了45年，但建筑修复比起新建来还是比较容易的。还有学者推测西宫使用了燕王府拆下的材料，“既清理出了营建北京宫阙的场地，又利用废材建筑了视朝之所，省时省力，节省建筑材料，免除清除大量废料，一举数得”^①。

永乐十五年（1417）二月十五日，朱棣设立了总管营建北京的机构，级别相当于都督府，用“缮工之印”，委任长期镇守北京的泰宁侯陈珪主持。当年十一月初二日，奉天殿和乾清宫同时动工。

永乐十七年（1419）十一月二十四日，“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②，即把南城墙向南拓展，城墙长度，包括南面新墙和东西两侧城墙向南延伸的部分。具体位置，是从今东、西长安街南侧向南推进约800米，到今“前三门”一线。

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1420年12月8日），朱棣颁布了著名的“建北京诏”：“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輿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今已告成。”^③这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明太宗实录》对营建北京工程做了一个总结性概述：“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是成。”^④总结把工程分成两部分，营建北京是第一部分，包括三大类工程，即太庙、社稷坛，郊祀坛场与宫殿门阙。第二部分是皇太孙宫和十王邸，共8350间房屋，工期三年半。如果据此把三年半当作营建北京的总工期是不准确的。

三、正统时期北京城继续完善

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日突发火灾，前朝奉天、华盖、谨身三座大殿全部焚毁。次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寝乾清宫又遭火灾。突发的灾害打断了营建北京的进程。宣德十年（1435）正月，正统皇帝继承皇位，对继续营建北京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修整北京城垣。正统元年（1436）十月二十九日，“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初，京城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改葺，然月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⑤。工程从修造城门城楼设施开始，到正统四年（1439）四月“修造京师门楼城濠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牌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濠，两涯悉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

① 王剑英、王红：《论从元大都到明北京宫阙的演变》，《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② 前揭《明太宗实录》卷二一八，第3页。

③ 前揭《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一，第2页。

④ 前揭《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二，第2页。

⑤ 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二三，第10页。

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流出大通桥而去”^①。估计在这两年半里，还在原来土城的外侧包砌了城砖。在修造城门楼期间，还宣布改定了北京各城门名，至今仍在使用。再者，大明立国已经百年，而北京的东西城墙一仍原旧，还是夯土城墙，一到雨季，屡遭破坏。“京师城垣其外旧固以砖石，内惟土筑，遇雨辄颓毁”，正统十年（1445）六月“命太监阮安、成国公朱勇、修武伯沈荣、尚书王骥、侍郎王佑，督工修甃之”。^②到正统十二年（1447）闰四月城墙内外包砌城砖竣工，标志着整修北京城垣工程全面完成，明北京城垣彻底取代了元大都土城。

第二件，重建三殿两宫。正统四年皇帝派遣工部尚书祭司工之神，下定了决心。正统五年（1440）二月调集了三万余名工匠和三万六千余军士投入工程。三月初六日“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是日兴工；遣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等告天地、太庙、社稷及司工等神。太宗皇帝营建宫阙，尚多未备，三殿成而复灾，以奉天门为正朝，至是修造之，发见役工匠、操练官军七万人兴工，其材木诸料俱旧所采办储积者，故事集而民不扰”^③。由于永乐、宣德朝遗留下大量木材物料，而且不需要做地下基础，所以这次重建工程的复杂程度远不及永乐朝。到正统六年（1441）九月初一日，三殿二宫重建告成，再次举行了遣官告天地、太庙、社稷、岳镇海渎的隆重仪式，实际施工工期共17个月；十月二十九日，皇帝一家入住乾清宫和坤宁宫；十一月初一日，皇帝御新殿举行朝会，同时更换了南北两京诸衙门的印信，去掉了在北京衙门的“行在”二字，彻底终止了洪熙时开始的“南归”动议。

第三件，在大明门千步廊两侧建设朝廷各衙署。正统七年（1442）四月十三日开始，“建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于大明门之东，翰林院于长安左门之东。初，各衙门自永乐间皆因旧官舍为之，散处无序。至是以宫殿成，命即其余工以序营建，悉如南京之制。其地有民居妨碍者悉徙之”^④。八月初六日，在大明门之西，建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在长安右门之西建行人司的工程也开工了。经过这次集中建设，从首都功能上，改变了元大都衙署“散处无序”的缺陷，把南京在皇城前布置朝廷衙署的规划，移植到了北京。正阳门里有一条北京最长的胡同，名东西江米巷，即今东西交民巷。在胡同以北，东、西长安街以南，基本与皇城等宽的广大地区，成为国家政务中枢区，按照文东武西的大原则，安置了朝廷各衙署。北京的三法司也比照南京做法离开中枢区，安排在宣武门大街西侧。正统七年所造衙署，还有会同馆和观星台。正统八年（1443）秋天，又对国子监进行了重建。北京国子监设在元大都孔庙原址，大明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修建工程。

从正统元年到十二年这三件大事（工程），是营建北京的一部分。它接续了被永乐十九年火灾打断的历史过程，奠定了明清北京城的格局，最终完成了改造元大都为明京师的伟大工程。这次成功的“旧城改造”，从永乐到正统，前后实际耗时26年。

① 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五四，第8页。

② 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一三〇，第8页。

③ 前揭《明英宗实录》卷六五，第2页。

④ 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九一，第4页。

四、嘉靖时期北京城的发展

嘉靖帝是明代第二位从藩王入主朝廷的皇帝，他继承了大明“皇统”，马上力争使他的家族从“分支”改为“本支”。于是他为了提升父亲兴献王为献皇帝并称睿宗，进行了一系列“礼制改革”。

（一）建造祭祀献皇帝专庙

嘉靖三年（1524）三月，嘉靖帝在遭到抵制的情况下，强行在奉先殿侧另建一室，以接父亲的神主来京奉安，命名为观德殿。嘉靖五年七月，他又以規制狭隘为由，移到奉先殿左方，改称崇先殿。

嘉靖四年（1525）五月，嘉靖帝又要求在太庙以外、皇城之内、南城宫殿区建立献皇帝庙，定名世庙，规模稍减于太庙。次年六月，世庙悬挂牌匾，九月奉安献皇帝神主。

（二）改永乐时期天地坛“合祀”为“分祀”，建立“四郊”制度

嘉靖九年（1530）二月，嘉靖皇帝发起了天地合祀是否合古礼的大讨论，要求朝廷各部文武衙门、大小官员都发表意见。结果，两个月后还是议论纷纭，嘉靖皇帝自己决定了天地分祀，同时把对日月的祭祀提升为郊祀，令大学士等去考察南郊。同年五月十三日，“四郊”兴工；十一月，“上谕礼部曰，南郊之东坛名天坛，北郊之坛名地坛，东郊之坛名朝日坛，西郊之坛曰夕月坛，南郊之西坛名神祇坛”。^①这次工程建造了5座祭坛及其相应殿堂。新的祭天坛台称圜丘，建在原南郊旧殿之南；祭地的坛台称方泽，建在安定门外；朝日坛建在朝阳门外；夕月坛建在阜成门外；神祇坛建在永乐山川坛内坛之南。嘉靖十年（1531）七月，皇帝因为“郊工”及神祇二坛并神仓工成，升赏了官员。^②嘉靖十八年（1539）六月，命工部在方泽坛北建造了两重大殿，即祭殿和拜殿。^③

（三）改建太庙

嘉靖十年九月，嘉靖皇帝召见大学士、尚书等官员，指出太庙制度不完善，“同堂异室”制度“在礼非宜”，要求在原太庙三座大殿都不动的条件下，改造成为每位先祖立庙的九庙制度。由于难度很大，工程迁延下来。嘉靖十三年（1534）六月，南京太庙发生火灾，有大臣乘机上言，这是上天在促成北京太庙的改造。于是到九月，诸臣细化了方案，绘图进呈。次年二月初八日，开始了分建九庙的工程。而且嘉靖皇帝还要求同时改建世庙，把它迁移到九庙附近。嘉靖十五年（1536）十一月二十三日，“增飭太庙，营建太宗庙、昭穆群庙、献皇帝庙工成”^④。嘉靖皇帝达成了十余年的心愿。在这一年的闰十二月发布的诏书中，他

① 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九，第9页。

② 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一二八，第7页。

③ 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二二五，第4页。

④ 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三，第8页。

特别说明了自己改建郊庙的理由，对我们今天理解他改革礼制的历史有重大参考价值。

不料五年以后，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初五夜，雨后突发火灾，“太庙群庙一时俱烬，睿庙独存”。^①二十二年（1543）筹备重建时，嘉靖皇帝要求廷臣讨论庙制，但大家都不敢说心里话，最后只好由皇帝自己发布决定，“兹当建立新庙，仍复旧制。前为太庙，后为寝，又后为祧”^②。估计是当年开始实施，到二十四年（1545）六月告成。

（四）继续“南郊”建设

嘉靖十年四月，圜丘坛建成时，还建造了一座神版殿，名“泰神殿”。十一年（1532）正月，又在圜丘东南的泰元门外，建了一座圆形的雩坛。嘉靖十八年八月，命建造皇穹宇，以奉安泰神之位。到第二年七月，皇穹宇完成了。^③

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月，嘉靖皇帝又启动了在圜丘坛南建设大享殿的工程；拆去了永乐祭天旧殿，亲自按“法象玄宇”进行设计。“建大享神御殿。其制六楹，四围阑干白石，其上青瓦，如皇穹宇色。大享殿前两庑，庑各十楹。前为大享门，又前砖门五，东西砖门各三，俱修饰之。撤旧具服殿。祭日设幕次其旁。”^④嘉靖二十二年十月遣工部尚书祭告兴工，二十四年六月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候，又先后明确了两座神版殿的殿名，圜丘坛神版殿原名泰神殿，改定为皇穹宇；大享殿藏神版之殿名皇乾殿。

建造大享殿名为复古“明堂大典”，其实核心是要在祭礼中，请睿宗献皇帝“配享”，把他的地位提到与太祖、太宗并列的高度。所以严嵩说“至是而古典始完”，达到了嘉靖皇帝礼制改革的目标。

（五）增加其他礼制建筑

嘉靖十年正月，太子辅导官廖道南提议按照南京规制，在北京建设历代帝王庙。当年九月工程就完工了。嘉靖十年七月，在国子监的北部，建设了启圣公祠，进一步增加了监生们尊孔活动的内容。

嘉靖时期为礼制改革所进行的建设活动，构成了北京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庙、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历代帝王庙等都遗存至今，主要建筑都保持了原结构。天坛的连续建设，给我们留下了这座北京城标志性的美丽建筑群。

（六）建设北京外城

嘉靖时期，北京还在城南建设了外城，北京城格局从此定型。约在嘉靖朝初期，蒙古各部落割据混战，俺答逐渐强大起来，大明西北部边境开始紧张起来。嘉靖二十一年，俺答劫掠大同一带长达34天之久；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更是包围北京，火焚安定门外民居，史称“庚戌之变”。当年十二月，在民间赞助下，

① 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二四八，第5页。

② 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二八〇，第4页。

③ 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二三九，第1页。

④ 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二七九，第4页。

为保卫北京前三门商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建造土城的工程开始了。不过，由于没有解决好居民甚至坟墓的搬迁问题，很快就中止了。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兵科给事中再次上言筑外城，嘉靖帝经过与首辅严嵩和众臣的讨论，提出需要修城墙围住京城四面，才符合“王制”的要求，于是采纳了这次建言。

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十九日（1553年5月1日）举行了告太庙仪式，宣布开工。皇帝亲谕各提督等官：“古者建国必有内城外郭，以卫君守民。我成祖肇化北京，郭犹未备，盖定鼎之初未遑及此。兹用臣民之议，先告闻于祖考，爰建重城，周围四罗，以成我国家万世之业。”^①开工后22天，皇帝又告诫严嵩，建城要讲实效，决不能“枉作一番故事”。严嵩把皇帝的想法传达给主持工程的陈圭诸人，他们反馈的意见是先从南面做起。皇帝又派严嵩去工地查看。严嵩回来报告说，正南一面工地有二十里长，困难之处在于夯筑墙基，必须深挖到实地，有的深可达五六尺、七八尺的。现在最困难的关坎已经过去，大部分夯筑已经冒出地面，高一二板至五六板的都有，最高一处达到十一板。因为地势有高低，培垫的土就有深浅，取土也有远近，所以工程难易也有不同。不过上板以后就容易见效了。皇帝则怀疑土筑的坚固性，批评做着看的态度“非建大事者之思也”，要陈圭等再议是否可以先做南面一面。大臣们回复说，版筑的方法只要取好土，就可以持久。原计划做四面，所以南面长度需达二十余里，如果只筑一面，只要东西两侧北转，接上京城东南、西南两角就可以了，总长只需十二三里。皇帝最后批准了只建南面的意见。这一年十月二十八日（1553年12月3日）新筑外城完工。皇帝命名城门：“正阳外门名永定门，崇文外门名左安门，宣武外门名右安门。大通桥门名广渠门，彰义街门名广宁门。”命名表示了外城门与内城南城墙的位置关系。全部工程用时7个月。

10年以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十二月初一日，“工部尚书雷礼请增缮重城、备规制。谓永定等七门当添筑瓮城，东西便门接都城止丈余，又垛口卑隘，濠池浅狭，悉当崇甃深浚。上善其言，命会同兵部议处以闻。”^②四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1564年2月10日）增筑瓮城开工，到六月二十七日完工，用时5个月。这次工程记载简略，我们从雷礼的建议中读到的信息有，北京外城除了皇帝命名的五座门以外，还有两座便门；外城创建十年后做了改善：七座城门都建了瓮城，垛口墙加高，护城河加深。

修建外城，使北京城的面积远远超过元大都城，中轴线从正阳门再次延伸至永定门，总长度达到十五里。

五、明北京城建设的文化意义

（一）“择中立国”传统得到新阐释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利用天文学观测日影的方法发现大地之“中”是上古帝王之事。文献记载舜时第二次测量求得天地之中，“这一切都在暗示着以九州为背景的中土、中域、中国观念的形成”，这一时代“也就是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及其制度的形成时代”^③。此后，“择天下之中以立国”^④则不仅延续上述观念，并把

① 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三九六，第6页。

② 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八，第1页。

③ 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④ 前揭《诸子集成·吕氏春秋》卷一七。

它发展成为对“正统”地位的追求。

忽必烈在即位蒙古国主之前，曾经与东平王霸突鲁讨论天下形势，霸突鲁说：“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蹕之所，非燕不可。”^①世祖曾说：“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蒙古是一个在传统“中土”北方发展的民族，霸突鲁、忽必烈引用古典，彰显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力。把元大都作为天下之中，实际上是作为蒙古民族进一步南下的根据地。

而明北京城建设是对元大都城的一次成功的旧城改造，从城市格局观察，洪武、永乐两朝的改造对城市大部分地区非但没有扰动，而且全面继承了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成果。从地理上看，形成了大都城址由北向南展开的一个过程。而从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看，北京城市新增加的城南区域的道路是对大都道路网的发展，所以中轴线南端，自然具有从正阳门向永定门延伸的潜质，而没有在东西向摆动的余地。它说明了元大都的规划不仅考虑了蒙古民族的需求，也已经具有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需求的要素。换言之，在百年时间里蒙汉民族已经实现文化融合，城市改造才有可能成功。而大明以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推行汉唐制度，也没有丝毫违和之处。

清代统治者兴起于东北森林地区，取代明朝廷统治全中国，仍旧以北京为国都，很明显是要凸显满族对大明“帝系”的继承。正如乾隆皇帝在《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一文所说，康熙皇帝调整入庙祭祀的历代帝王名单，表明了“一统帝系之公”。“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②“择中立国”中的地理因素已经被“帝系正统”的政治理念所取代。

（二）建立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都城图式

嘉靖以后的明代和整个清代，北京城没有再发生大的改变。它成为古代中国最后一个都城。它的结构以至各殿门额名称都蕴含着悠久的传统，有些因素具有明确传承。就明代自身来说，也是经南京、凤阳而后定型的。

城市的核心是宫城，《万历会典》称为紫禁城。城墙作南北长的矩形，城外环绕护城河。南北中轴线上，南城名午门，北名玄武门（清代改称神武门）。东西城墙偏南位置开东、西城门，名东华门和西华门。

城内主要建筑分为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前朝建筑有三条并列的纵轴线。中轴线上，前朝三座大殿建在同一座须弥座高台上，称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嘉靖时改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代改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外围一周庑房。奉天殿居庑房中央，南庑房中央建奉天门（嘉靖时改为皇极门；清代改为太和门）。左右庑房中间偏南建文楼和武楼（嘉靖时改为文昭阁和武成阁；清代改为体仁阁和弘义阁。清初在两阁之北建左翼门和右翼门）。庑房四角建崇楼。中轴之东建文华殿建筑群，中轴之西建武英殿建筑群。

内廷部分可以分成东、西并列的五个板块。谨身殿北有一个横长的广场，广场之北即内廷的中轴板块。在中轴线上也在一座大台基上建三座主要建筑，称为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周围建一周庑房。庑房南部正中建乾清门，北部有坤宁门。庑房东西两侧各对称地开五座门，通向寝宫。坤宁宫后有御花园。

① 《元史》卷一一九《霸突鲁附传》，清乾隆四年刻本。

② 《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20页。

紧邻中轴两侧的板块建筑是对称安排的，最北部为皇子们的居所，称为东、西五所；中部是后妃寝宫，称东、西六宫。南部，东面建奉先殿，也称内太庙；西面在嘉靖时改为养心殿。六宫板块再东，明代是太后居所，乾隆时改为太上皇宫殿，称宁寿宫；再西，是咸安宫和英华殿。千门万户的宫殿及其额名，起源于吴王宫殿，到大明南京时定型，北京宫殿大部分是移植，只是“高敞壮丽过之”。

皇城围在宫城之外，考古工作者认为它基本是就元萧墙旧址改建的。皇城墙砖砌，黄琉璃瓦，抹红灰，城门是殿宇式，与普通的城墙完全不同。皇城的南、北门建在宫城中轴线的延长线上，但皇城城墙并不与中轴线重合。在宫城南部，午门前的御街和两庑直达皇城南墙。宫城北部堆有万岁山（清代称景山），再北有南北大街达皇城北门。所以皇城东西是不能通行的。

皇城南门远远地在皇城之南，称为大明门。门内向北为天街，街两旁的庑房称为千步廊，延伸了一百间之后折向东、西各三十四间，在尽端各建一座三间东西向的砖门，叫作长安左、右门，与千步廊围成一个T字形广场，北面正中建有宏伟的承天门（清代称天安门）。皇城东、西门名为东安门、西安门，北门名北安门（清代称地安门）。这样，明代皇城南面三座门，其余三面各一门，总计六门。清代乾隆以后皇城以天安门为南门，故统计为四门。

进奉天门里，还有一座端门，这是为表示宫门层次而设的。^①从奉天门经端门到午门两侧皆为庑房，其东建有太庙，其西建有社稷坛。这种安排是凤阳创造的。太庙之东，永乐时还比较空旷，后经明朝几代君主建设为“南内”宫殿。宫城之西是太液池的宽阔湖水，在元代木吊桥的位置改建了一座石桥，连通从宫城北到皇城西门的道路。石桥南部在永乐时建有西宫。皇城内其他地区主要安排内官衙署和居住用房，整个明代都是禁区。清代开放了皇城。

洪武初期的皇城称为内城，包括两重墙垣。凤阳则明确了皇城的设置，而且确定了六门制度与门名。然后复制到南京，最后移植到北京。

北京内城围在皇城之外，它的南北轴线与宫城中轴线重合。明北京内城形态规整，与南京不同；城门设置与中都城也完全不同。所以北京内城形态还是与元大都密切相关。北城墙是北平府城，因受积水潭影响，西侧稍折向南；开东、西两座城门是元大都北城门的内收。东、西城墙和城门位置都是继承自元大都。南城墙是永乐时所建，正门及东、西二门的建置沿袭自元大都。

北京外城只建南面一面，形成层层相套的城墙构图意象。在国都建外城有古老传统。明代南、北京外城都是出于战略要求、因地制宜营造的，形态的差异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北京外城较完美地延续了永乐—正统改造北京的成果，实现了首都城市的南拓。

明北京城的“图式”表现了顽强的文化传承的力量。

（三）形成了官式建筑技艺传承的重要环节

中国建筑学的开拓者梁思成先生提出，中国古代建筑中存在“官式建筑”体系。因为我国很早就设置了

① 晋宏逵：《明代北京皇城诸内门考》，《故宫学刊》，2016年总第17辑。

工官，管理“百工之事”。如果给官式建筑一个定义的话，可以是“由官方管理，遵循官方标准，组织工匠进行材料采办、烧造、构件制作并且安装的建筑”。很明显，与民间建筑相比，它往往更具有材料选择以及技术与艺术的优势。

明代营建北京城，不仅是当时的国家大事，也为今天遗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建筑遗产，包括城池（长城）、宫城、宫殿、园林、礼制（祭祀）建筑、陵墓等几乎所有建筑类型，使北京成为明代官式建筑最集中的地区，是明代官式建筑的宝库。根据它们所具有的宝贵的文物价值，其中大部分都已经公布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宫、十三陵、北京中轴线等还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比宋、元、明的官式建筑，可以发现它们既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又存在共同的构造方法和结构逻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中国营造技艺的长期有效传承与发展。

《营造法式》记录了北宋末期的主要建筑工种10种，分别是壕寨（土作）、石作、大木作、小木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还有附属的雕作、旋作、锯作和刷饰。元代在大都城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在工部设“诸色人匠总管府”“诸司局人匠总管府”“诸路杂造总管府”“大都人匠总管府”等机构进行管理。大都的管理机构“大都留守司”负有“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以及“内苑花木”的责任，其下属司局直接拥有匠户，如修内司设有大木局、小木局、泥厦局、竹作局，祇应司设油漆局（掌两都宫殿髹漆之工）、画局（掌诸殿宇藻绘之工）、销金局（掌诸殿宇装鋈之工）、裱褙局（掌诸宫殿装潢之工）、烧红局（掌诸宫殿所用心红颜料）。凡精巧工艺、杂作匠户都归属器物局，下设铁局（掌诸殿宇轻细铁工）、采石局（掌夫匠营造内府殿宇寺观桥闸石材之役）。^①这些工匠在大都往往按工种聚居。“南城彰仪门外，去二里许，望南有人家百余户，俱碾玉工，是名磨玉局。”^②工匠人身相对固定在大都城，传宗接代，同时也进行着技艺的传承。在营建北京的工程中，必定有这些工匠的传人参加了工作。如明英宗时，著名石匠陆祥，他的家族就世代从事石匠工作，先祖在元朝曾任“可兀阑”，即将作大匠。

我们在明代文献中查到的工种，有木匠、瓦匠、石匠、土工、搭材匠、油漆匠、竹匠、五墨匠、裱褙匠、雕銮匠、锯匠、窑匠、窑冶匠、烧石灰匠、黑窑匠、琉璃匠等，说明营造业的各工种在漫长的宋、元、明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永乐时营建北京城时“征天下诸色工匠”参加到营建工程中来，实现了全国各地营造技艺的一次空前的交流，必定有一些地方营造手法使用到北京城建筑中，融入明代官式建筑体系形成过程中来。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编辑：刘梦雨）

① 《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清乾隆四年刻本。

② 前揭《析津志辑佚》之“古迹”，第115页。